



四川大学考古专业编

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 三十五周年纪念文集

四川大学出版社





四川大学考古专业编

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 三十五周年纪念文集

四川大学出版社

(川) 新登字 014 号

责任编辑：李慧宇

封面设计：冯先洁

技术设计：李永宪

责任校对：黄 伟 李永宪 李慧宇

责任印制：张 凡

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三十五周年纪念文集

四川大学考古专业编

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望江路 29 号)

新华书店经销 西南冶金地质印刷厂印刷

787×1092mm 16 开本 1 插页 27.625 印张 600 千字

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1300 册

ISBN7 - 5614 - 1170 - 7/K·123 定价：48.00 元

四川旧石器时代遗存浅论

叶 茂 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一、前 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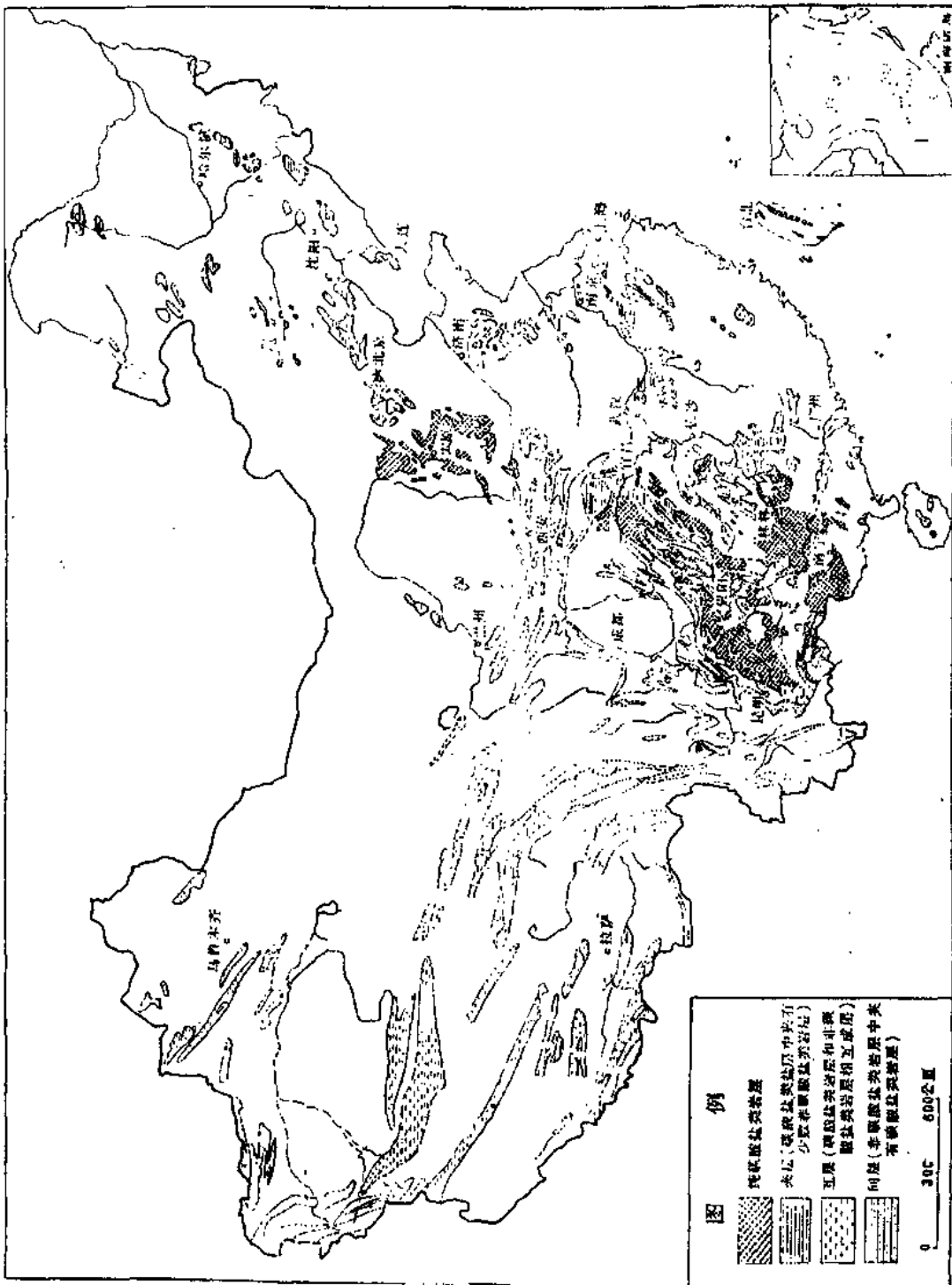
四川位于祖国的西南地区，地理位置处在北纬 $25^{\circ}\sim 35^{\circ}$ 之间，居于长江上游，大部分地域由纵横发达的长江水系相联贯。北与黄河流域的西北地区为邻，东与长江中游沟通，西部和南部连接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是大西南与中原和北方交往的一个门户。

在地貌上，川西高原和青藏高原合为一体，川南及东南部山区与云贵高原山区相连续，川中盆地以冲积平原和起伏的丘陵以及发育的河谷为特征，川北及川东山脉岭系相回绕，表现出独特而多样的地貌景观和既独立又外联的区域地势。

四川的碳酸盐类岩石分布广泛，岩溶地貌发育。特别是川东、川南岩溶区与云贵高原的岩溶地貌构成整体。在其它地带，也分布着夹层、互层或间层的碳酸类岩层，岩溶有着一定的表现。在盆地内，还广布着深埋地下的碳酸盐类岩溶^[1]。岩溶地貌的发育为远古人类提供了天然的洞穴、岩厦等居所，岩溶沉积又为保存古人类化石及文化遗存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四川境内大小河流纵横交错，河流阶地和河谷发育^[2]，为古人类的生存活动营造了理想的环境，也成为一种重要沉积条件而保存了较丰富的遗存。

四川特定的地理环境，随着不断深入的地质古生物、古地理、古气候等相关学科的研究，特别是相邻周边地区古人类、古猿和旧石器考古发现成果的积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四川这个宝地的潜在考古价值^[3]，这是一个需要十分重视的重要区域。而四川已有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也愈来愈证明了这一点。

四川的旧石器时代考古活动，有记录可考的，大约可追溯到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由当时寓居四川在华西联合大学任教的几位牧师和学者双重身份的人物，先后开始了有一定目的的调查、搜集石器资料的活动，随后几位外国考古学家分别也作过一些调查。他们的行程主要是沿长江和岷江水道，以及大渡河和雅砻江水道，采集到一些石器。其中，如叶长青、戴谦和、葛维汉等人的工作比较具有参考价值，但是他们的收获，现在看来，主要都是新石器时代以后的资料，真正属于旧石器时代的遗物，几乎没有。这些材料可以从郑德坤所写的《四川石器时代文化》一稿和《四川古代文化史》一书中看到比较详细的归纳和描述。这大体上就是旧中国留下来的关于四川石器时代遗存的全部材料，这些实物据说还有留存于原华西联合大学博物馆



图一 中国碳酸盐类岩石分布图 (采自《岩溶学概论》)

(今四川大学博物馆)中,这其中包括相当多的石头^[4]。

四川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应该说是从新中国成立以后才真正起步并逐步深入的。从1951年在成渝铁路施工中发现资阳人化石开始,随后比较重要的发现主要有:60年代发现富林文化旧石器,70年代发现铜梁文化旧石器和鲤鱼桥文化旧石器。80年代的发现显著增加,这是人们逐步认识到四川在旧石器时代和人类进化方面的潜在价值,不仅更加重视偶然的零星发现,而且开始了主动的专题考察、重点的考古调查和考古发掘。这期间最重要的收获是巫山猿人化石的发现,其次就是通过多个单位的共同考古探索和研究,取得了对资阳人化石地层和年代问题与原研究者相同的共识,这是四川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一项重大成果。90年代发现的重点将是长江三峡库区。

目前,四川旧石器时代的遗存已发现不少。随着资料的积累,有必要对现有材料进行阐述并加以总结,从而提出新的课题,促使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本文拟就现有成果进行初步归纳和评述,以求教于专家。

二、发现与研究

旧石器时代早期

直到1985年,考古工作者才在四川发掘到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存,这便是引起世人关注的巫山龙骨坡的重要发现^[5]。

巫山猿人遗址位于巫县长江南岸的大庙区庙宇镇附近的龙坪村,这里的龙骨坡曾出土过化石。1984年夏,由重庆自然博物馆和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及地县文物单位组成的联合考察队,调查了这个地点,随后从1985至1988年,连续四年对龙骨坡进行了考古发掘,其中第一次工作就发现了人化石和巨猿化石。1987年和1988年又发现了两件石器和一些骨制品。与此同时,对遗址进行了孢粉分析和古地磁与氨基酸的年代测定。含人化石和文化遗物的地层,经古地磁测定为距今200万年,氨基酸测定大体与之吻合,而且还要略早(239万年)。从地层学上推断的地质年代为早更新世早期,与测年结果也是吻合的。所以从年代学上讲便已经有较充足的理由肯定巫山猿人的时代。这是中国迄今为止年代最早的直立人化石,比元谋猿人和西侯度文化都还要早二三十万年。

龙骨坡遗址系埋藏型的垂直型溶洞为沉积相的洞穴堆积遗址。虽无洞顶,但有岩厦式的洞壁,而洞壁曾坍塌、夷平,现存为山坡状地貌。洞内地层堆积由角砾岩、粘土、砾石、淤泥等构成,可分为上下两部分堆积单元。上部堆积单元由角砾岩为主,厚达12米,仅底部含很少量动物化石。下部堆积单元由粘土、砾石层、淤泥等依次叠压为含化石或不含化石的若干层次的堆积,厚达20米以上,其下未见底。由于遗址为坡状,发掘点上面已无上部堆积单元,下部堆积单元的上部堆积也已不存,实际发掘的为下部堆积单元,大量动物化石等遗存均分布其中,并主要是在这个单元的中部,包括人化石、巨猿化石、石器、骨制品等。

目 录

四川旧石器时代遗存浅论	叶茂林 (1)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区系与分期	罗二虎 (24)
关于良渚文化研究的若干问题	朱乃诚 (39)
良渚文化玉琮的对外传播	李映福 (61)
试论白龙江流域新石器文化与川西、川北新石器文化的关系	张强禄 (70)
中原地区早期古城址的发现与初步研究	杨肇清 (76)
试论中国文明的起源及其形成	范 勇 (87)
安阳小屯东南灰坑 55H1 的绝对年代	彭裕商 (99)
殷墟卜辞出土情况分析	方述鑫 (107)
对二里头文化的几点认识	高大伦 (126)
关于商代的俯身葬问题——附说商代的族墓地	杨升南 (138)
成都十二桥遗址的文化性质及分期研究	江章华 (146)
湖南商代铜器新探	向桃初 (165)
论四川出土的商代西周青铜礼器	施劲松 (179)
洛阳西周青铜礼器研究	张 剑 (190)
云南出土青铜时代铸范及其铸造技术初论	王大道 (210)
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综述	徐学书 (222)
战国秦汉考古研究的思考	宋治民 (246)
浅析广州西汉前期墓葬中的楚文化因素	李明斌 (256)
论汉代夫妻合葬墓的类型与演变	黄 伟 (264)
广西汉墓形制初探	陈 文 (286)
河南偃师县南蔡庄乡东汉墓出土道人肥致碑及有关道教遗物研究	张勳燎 (301)
唐武则天至玄宗开元年间北方唐代壁画墓	唐俊玲 沈淑玲 余扶危 (312)
试从考古发现铭刻材料看唐初的二名不偏讳问题	白 彬 (320)
考古出土的唐密遗存及其对日本密教的影响	霍 巍 (330)

莲花纹瓦当考	卢 丁 (339)
考古所见中国古代厨师形象略说	王仁湘 (343)
1964 年成都附近四县考古调查追记	林 向 (368)
1994~1995 年度四川云阳李家坝遗址的发掘	
..... 四川联合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374)
胸忍考略	陈 剑 (423)
四川省云阳县旧县坪遗址试掘简报	四川联合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425)
后 记	(440)

四川旧石器时代遗存浅论

叶 茂 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一、前 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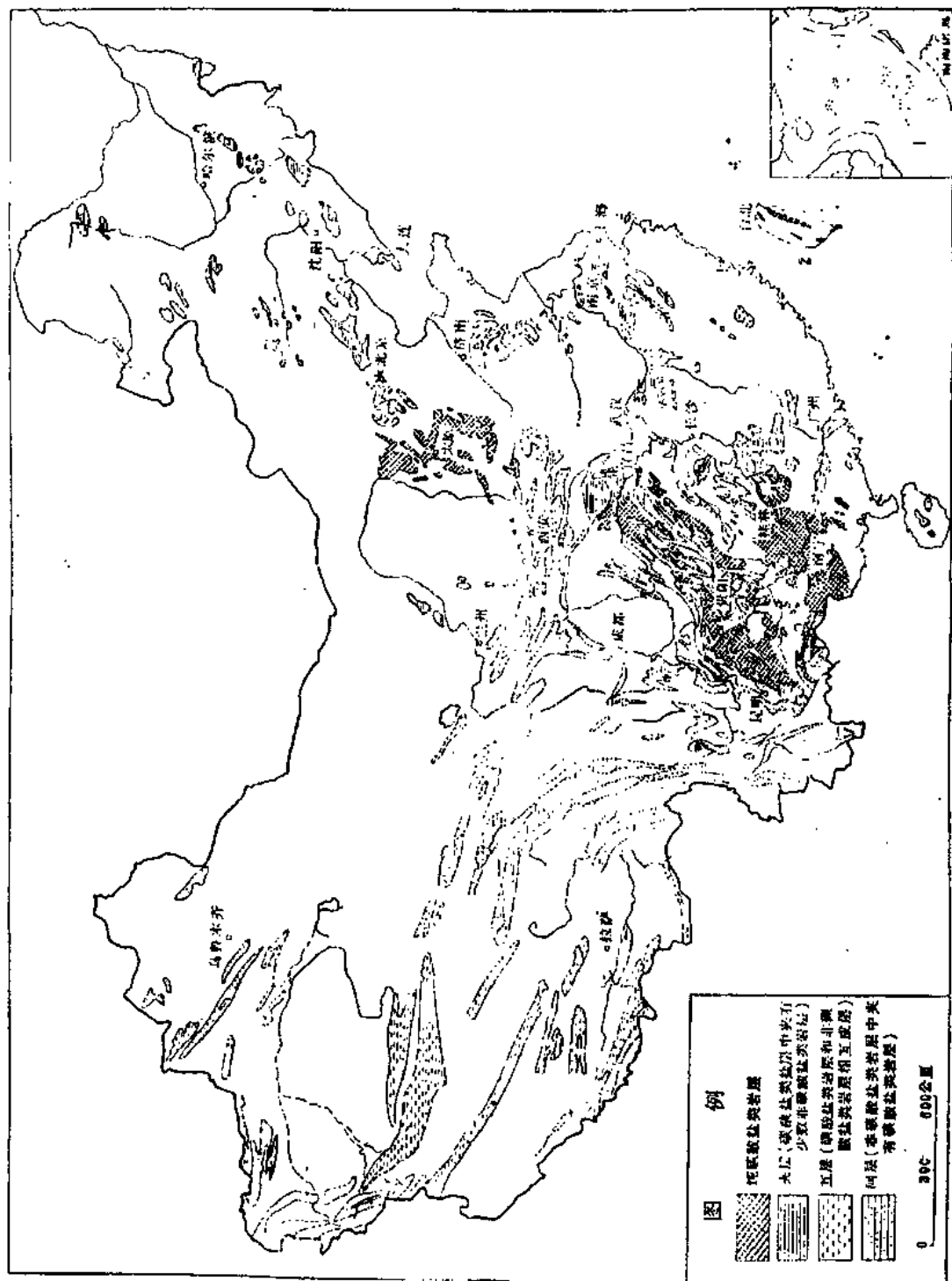
四川位于祖国的西南地区,地理位置处在北纬 $25^{\circ}\sim 35^{\circ}$ 之间,居于长江上游,大部分地域由纵横发达的长江水系相联贯。北与黄河流域的西北地区为邻,东与长江中游沟通,西部和南部连接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是大西南与中原和北方交往的一个门户。

在地貌上,川西高原和青藏高原合为一体,川南及东南部山区与云贵高原山区相连续,川中盆地以冲积平原和起伏的丘陵以及发育的河谷为特征,川北及川东山脉岭系相回绕,表现出独特而多样的地貌景观和既独立又外联的区域地势。

四川的碳酸盐类岩石分布广泛,岩溶地貌发育。特别是川东、川南岩溶区与云贵高原的岩溶地貌构成整体。在其它地带,也分布着夹层、互层或间层的碳酸类岩层,岩溶有着一定的表现。在盆地内,还广布着深埋地下的碳酸盐类岩溶^[1]。岩溶地貌的发育为远古人类提供了天然的洞穴、岩厦等居所,岩溶沉积又为保存古人类化石及文化遗存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四川境内大小河流纵横交错,河流阶地和河谷发育^[2],为古人类的生存活动营造了理想的环境,也成为一种重要沉积条件而保存了较丰富的遗存。

四川特定的地理环境,随着不断深入的地质古生物、古地理、古气候等相关学科的研究,特别是相邻周边地区古人类、古猿和旧石器考古发现成果的积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四川这个宝地的潜在考古价值^[3],这是一个需要十分重视的重要区域。而四川已有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也愈来愈证明了这一点。

四川的旧石器时代考古活动,有记录可考的,大约可追溯到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由当时寓居四川在华西联合大学任教的几位牧师和学者双重身份的人物,先后开始了有一定目的的调查、搜集石器资料的活动,随后几位外国考古学家分别也作过一些调查。他们的行程主要是沿长江和岷江水道,以及大渡河和雅砻江水道,采集到一些石器。其中,如叶长青、戴谦和、葛维汉等人的工作比较具有参考价值,但是他们的收获,现在看来,主要都是新石器时代以后的资料,真正属于旧石器时代的遗物,几乎没有。这些材料可以从郑德坤所写的《四川石器时代文化》一稿和《四川古代文化史》一书中看到比较详细的归纳和描述。这大体上就是旧中国留下来的关于四川石器时代遗存的全部材料,这些实物据说还有留存于原华西联合大学博物馆



图一 中国碳酸盐类岩石分布图 (采自《岩溶学概论》)

(今四川大学博物馆)中,这其中包括相当多的石头^[4]。

四川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应该说是从新中国成立以后才真正起步并逐步深入的。从1951年在成渝铁路施工中发现资阳人化石开始,随后比较重要的发现主要有:60年代发现富林文化旧石器,70年代发现铜梁文化旧石器和鲤鱼桥文化旧石器。80年代的发现显著增加,这是人们逐步认识到四川在旧石器时代和人类进化方面的潜在价值,不仅更加重视偶然的零星发现,而且开始了主动的专题考察、重点的考古调查和考古发掘。这期间最重要的收获是巫山猿人化石的发现,其次就是通过多个单位的共同考古探索和研究,取得了对资阳人化石地层和年代问题与原研究者相同的共识,这是四川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一项重大成果。90年代发现的重点将是长江三峡库区。

目前,四川旧石器时代的遗存已发现不少。随着资料的积累,有必要对现有材料进行阐述并加以总结,从而提出新的课题,促使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本文拟就现有成果进行初步归纳和评述,以求教于专家。

二、发现与研究

旧石器时代早期

直到1985年,考古工作者才在四川发掘到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存,这便是引起世人关注的巫山龙骨坡的重要发现^[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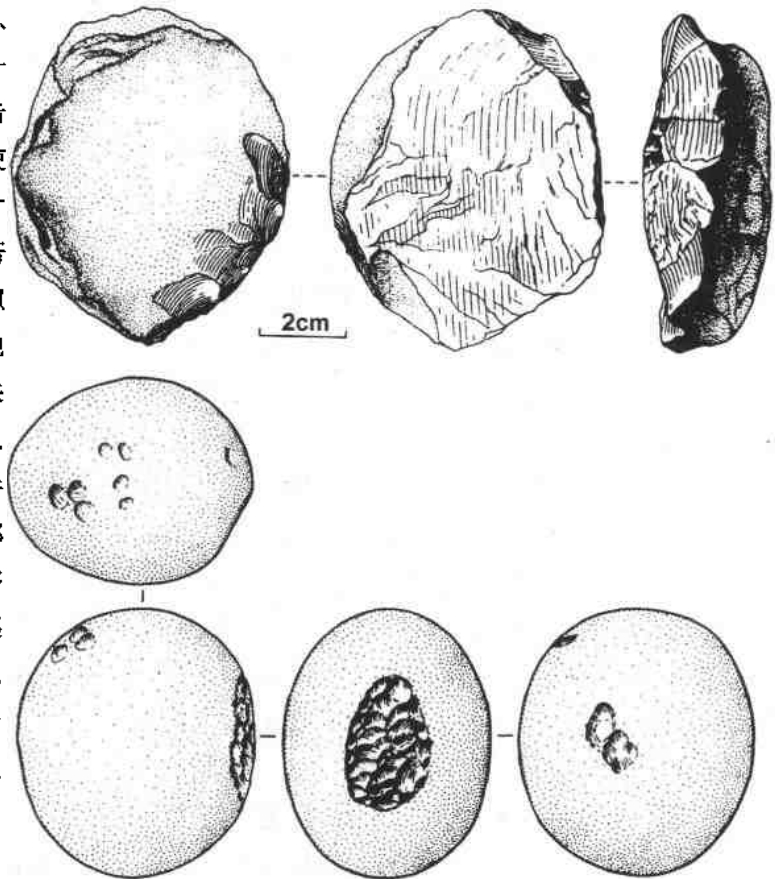
巫山猿人遗址位于巫山县长江南岸的大庙区庙宇镇附近的龙坪村,这里的龙骨坡曾出土过化石。1984年夏,由重庆自然博物馆和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及地县文物单位组成的联合考察队,调查了这个地点,随后从1985至1988年,连续四年对龙骨坡进行了考古发掘,其中第一次工作就发现了人化石和巨猿化石。1987年和1988年又发现了两件石器和一些骨制品。与此同时,对遗址进行了孢粉分析和古地磁与氨基酸的年代测定。含人化石和文化遗物的地层,经古地磁测定为距今200万年,氨基酸测定大体与之吻合,而且还要略早(239万年)。从地层学上推断的地质年代为早更新世早期,与测年结果也是吻合的。所以从年代学上讲便已经有较充足的理由肯定巫山猿人的时代。这是中国迄今为止年代最早的直立人化石,比元谋猿人和西侯度文化都还要早二三十万年。

龙骨坡遗址系埋藏型的垂直型溶洞为沉积相的洞穴堆积遗址。虽无洞顶,但有岩厦式的洞壁,而洞壁曾坍塌、夷平,现存为山坡状地貌。洞内地层堆积由角砾岩、粘土、砾石、淤泥等构成,可分为上下两部分堆积单元。上部堆积单元由角砾岩为主,厚达12米,仅底部含很少量动物化石。下部堆积单元由粘土、砾石层、淤泥等依次叠压为含化石或不含化石的若干层次的堆积,厚达20米以上,其下未见底。由于遗址为坡状,发掘点上面已无上部堆积单元,下部堆积单元的上部堆积也已不存,实际发掘的为下部堆积单元,大量动物化石等遗存均分布其中,并主要是在这个单元的中部,包括人化石、巨猿化石、石器、骨制品等。

人类化石两件，一为左下颌残骨，附带两枚臼齿；另一件为上门齿。定名为直立人巫山亚种，简称巫山猿人。两件化石分属两个个体。门齿的铲形特征，已显示了黄种人的性质，且形态较小，下颌骨上的第四前臼齿和第一臼齿也较小，在其它某些形态方面，也显示出一定进步特征。有学者认为“与常见的早期直立人不同，在很多方面与现代人相似。”^[6]这是在中国古人类旧石器时代考古中遇到的又一个令人困惑的难题^[7]，即体质特征进步而地质时代古老的矛盾现象，类似现象在我国已见多例，如金牛山、东谷坨等。

出土的两件石器标本，均为安山玢岩，形态虽不很典型，但研究者已排除了自然力造成的可能性，肯定为人工制品。一件称为凸刃砍砸器，长7.9，宽6.4，厚2.4厘米，有可能是利用自然破碎石块的一侧端作砍砸使用，刃部有短宽的剥落疤痕，即使用痕迹，当然也可能这种疤痕是加工痕迹。不过我以为前一种可能性较大。

另一件称作石锤，长径8.3、短径7.6、厚6.5厘米，系利用一椭圆砾石制成。一种可能是砸击使用，另一种可能是兼作石锤使用，石锤一面留有较集中的成片的坑疤，同时在一端面上还有若干零散的小疤痕。成片的疤痕似可以肯定是砸击痕，零散的小疤痕则有可能是锤击痕，不过看来是以砸击为主要使用方式，而总的说来，疤痕反映使用的频度并不很高。可以说上述两件标本都以使用痕迹为显著，而明显能够肯定为加工制造的典型石器还有待发现，这是令人不满足的。发掘者还发现了少量的几件骨制品，在排除了其他可能性之后，认为是利用食草类动物的骨块修理出尖刃，形态比较原始。早期骨制品在我国考古界历来存在认识上的较大分歧，对此很



图二 巫山猿人石器

值得引起注意。发掘者曾推测，或许当时人类“使用的工具以骨、角制品多于石制品”。

龙骨坡出土脊椎动物化石约四千多件，其中有鸟类2种，哺乳类116种，并鉴定出25个新种，这是迄今在同一地点所获动物化石种类最多的。这之中又以食草类动物占多数，许多食草

类动物骨骼残碎，以幼年和老年个体居多，或许可能有的是巫山猿人的猎获物。发掘者也推测，许多碎骨与人类活动有关。

按照层位关系分析，不同层次的化石组合，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地层的早晚时代，同时也为探讨巫山猿人生活环境的变迁提供了可靠依据。据研究，龙骨坡动物群具有华北、华南、西南三个动物区系的过渡特点，并且以华南型为主，同时它又构成了现生动物区系的初步格局。从时代和环境两方面考虑，据认为巫山猿人时代，可能云贵高原尚未形成，但青藏高原已经隆起；长江水道可能仅有雏形甚至未形成天堑阻隔，本地区及附近区域地壳抬升也不够，地形起伏尚不明显，有利于动物的迁移，这样构成了遗址内动物群的上述特点。动物群的上述特点反映了湿热森林为主的气候和景观，同时分析认为存在短时相对温降干燥的气候和局部草原灌丛地带。孢粉分析结果显示，龙骨坡下部堆积单元（含人化石及其它遗存）的地层剖面，反映了暖湿——冷干——暖湿——冷干两个变化旋回，暖湿期植被可能为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冷干期植被可能为稀疏的针阔叶混交林。这与动物化石的分析基本相同。巫山人生活的时代（即下部堆积单元的中部层位）早期赶上干冷期，后期主要是处在暖湿期中，有一个温暖湿润的森林环境。

巫山猿人地点出土的文化遗物很少，与有关已知材料的可对比性也显不足，目前还无法较全面地了解其文化面貌及发展，这都有待今后进一步的发现。不过巫山猿人对中国早期人类和文化的探索增添了资料，也为四川及相关地区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提出了新的问题。过去我们所获得的中国最早期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和早期猿人的资料，都是露天堆积中出土的^{〔8〕}，而巫山猿人地点是洞穴堆积，看来探索更早期的人类遗存，洞穴堆积也是不可忽视的，尤其是在西南地区。相应的，人类进入洞穴生活的时代看来也可能大大地提早。在巫山猿人的时代，中国南方的地貌环境可能与现代是大不相同的，因而越早期的人类活动越应充分考虑到与现代不同的古地理古生态的自然环境。从四川这个地域来说，巫山猿人之后，存在着非常多的缺环，弥补缺环还需要大量的考古发现和大量的研究工作。

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较后阶段的文化和晚期猿人的材料，目前四川还是空白。

旧石器时代中期

四川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存一直缺乏，但新近有报道说，在长江三峡库区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中，发现有距今十多万年的旧石器遗存，这有可能是或接近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年代，如丰都桂花村遗址。在配合三峡工程的考古工作中，在长江四川段内发现过一些被认为是旧石器时代的遗存，可能还包括一些遗址，如果不是经过更深入的工作，对它们的时代的判断可能都还难有足够的把握，由于缺乏精确的年代分析，因而认识往往还比较模糊，断代也比较笼统。这些材料中，恐怕既有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也会有中、晚期的，内涵并不单一，亟待进一步发掘以取得深入的了解和更全面的资料。

丰都桂花村遗址系旧石器制造场^{〔9〕}，经1993~1994年调查发现确认为旧石器时代遗址，1995年经发掘揭露遗址面积五十多平方米，出土各类旧石器标本2200多件，包括砍砸器、尖状器、石锤、刮削器、石核、石片等，均属砾石石器。石核以单台面为多，打片以锤击法为主，也

有少数使用碰砧法。石器类型以砍砸器为主，刮削器较少。文化面貌据认为基本上属于中国南方旧石器文化系统。从所述一些表面特征看，桂花村旧石器和湖北大冶石龙头遗址旧石器较为接近^[10]，可能存在一定的联系。发掘者将其定为旧石器时代早期，认为是目前我国发现的单位面积内石制品最丰富的旧石器早期石器制造场遗存。在已揭露的范围内，遗物极为密集。在已清理的地层之下，还有下部文化堆积，据悉，最近又继续发掘了下层遗存，估计下层遗存可能确已进入旧石器时代早期。

旧石器时代晚期

四川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存中，绝大多数都是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有的是零星发现，有的资料较丰富，目前已定名的有三个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在研究方面，相对说来四川旧石器晚期遗存的研究比较深入，涉及面也比较宽，但是至今还缺乏综合研究的系统论述，故将有关遗存分述于下。

1. 资阳人化石

1951年成渝铁路修筑工程中，在资阳黄鳝溪发现了许多哺乳动物化石，其中包括资阳人的头骨和腭骨化石。随即裴文中先生赶往资阳实地调查发掘。在发现化石的地点发掘了两个探坑，搞清了地层堆积，出土了一些动、植物化石和一件骨锥，没能发现更丰富的资料，但是对于埋藏化石的地质环境和地层时代都有了较清晰的了解。之后，裴文中先生和吴汝康先生对资阳人化石的发现材料做了深入全面的研究，1957年出版了资阳人的研究报告^[11]。

资阳人化石具有较深的石化程度，材料包括一个大部完整的头盖骨和一块完整骨性硬腭，研究者认为属于同一个体。资阳人头骨的一般体质特征属于晚期智人，而且在形态上还保留一些原始性状，因而认为是较早期的晚期智人。资阳人头骨内外的骨缝愈合不一致，内侧先于外侧愈合，因而从外面骨缝愈合情况不能反映其年龄程度，起初学者们都将其年龄定为十多岁的未成年人，只有冯汉骥先生推测它至少是一个成年女性。后来发现内面骨缝愈合完全，重新讨论其年龄，于是改定为可能在50岁以上的老年女性个体，年龄确定以后，其他有些特征如头骨细小、平滑等，便只能视为女性特有。秦学圣先生对资阳人年龄性别的鉴定结果，提出了一些保留意见^[12]，认为头骨化石经过水流冲刷，因而表面较平滑，另外一些被认为是原始性质的特征，也可能是男性特征，如显著的眉脊和粗大的乳突等性状，同时对年龄概念也不够满意。经过争论，现在仍一般多采用中年以上女性个体的结论。

资阳人化石出土地点的动物化石，从石化程度、比重测定、含氟量分析以及动物群组合来看，明显可以划分为早晚两组，裴文中先生认为早期的可能代表中更新世，晚期的为晚更新世，人化石属于晚期的一组。鉴定的动物种属有：马、鹿、麝、猛犸象（为晚期组），犀牛、水鹿、东方剑齿象（为早期组），鬣狗、虎、箭猪、竹鼠、猪、牯牛、猪獾等（不能判明早晚，可能早晚两组都有）。在对猛犸象的认定上，还有些不十分肯定，另有研究者也表示过怀疑^[13]。实际上，除了猛犸象外，其余种属一般都可以包容在南方动物群内。对于南方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其时代要根据其中绝灭种与现生种的具体比例分析而定。而上述研究中的早晚两种划分，是在

不明确化石共存还是分属不同地层的情况下作出的，既有合理的成分也有不合理的成分，尤其是把早期组定为中更新世，显然不够可靠。如果笼统地把这批动物群归于晚更新世，而以大量的现生种为由进一步确定为晚更新世晚期，那么可能相对要妥当一些。

资阳人化石的地层堆积，据裴文中先生的研究，从上至下的第一层为相当厚的红黄色粘土层；第二层为泥沙淤积层，含有洪水冲倒的乌木；第三层为小砾石和砂（上部）的堆积，含晚期化石组及人化石；第四层约当中更新世，为巨大砾石层，所谓早期化石组应属此层。第一至三层均属晚更新世。但是，裴文中先生忽视了这里是河流阶地，因为化石出自脱离了原生层位的阶地中，又缺乏详细记录，只是靠当事人回忆，而所述又互有出入，所以化石究竟属于哪个时代的地层，是不很明确的。冯汉骥先生对此深有所感，曾撰文说明，可惜生前并未发表^[14]。当时，文物征集者甚至还采用了悬赏的办法想寻求更多的化石材料。这些也都给裴文中先生的研究带来了困难。冯汉骥先生和秦学圣先生都认为资阳人地点的化石群，可能都是经水流冲带来的，因而问题就更加复杂。鉴于这个原因，有许多研究者都认为，资阳人化石并非出自原生地层，因此资阳人的年代依地层是不可靠的。

资阳人化石从发现一开始，就带来了许多问题，但是起初还不是那么尖锐。1972年考古所公布了第一批碳十四测年数据，其中有贵阳地球化学所1965年采集资阳人地层乌木标本测定年代，为距今 7485 ± 130 年，当时尚未经树轮校正，但学者们已经感到即使校正后它的年代也早不到旧石器时代的下限（经校正为公元前6222~5989年）。于是资阳人地层和年代问题变得尖锐，安志敏先生和夏鼐先生先后分别对此提出看法^[15]，成都地质学院第四纪科研组经过长期实地工作，也对资阳人化石地层的时代问题提出商榷^[16]，与此同时或之后，有关科研单位又采集了化石地点的若干乌木标本加以测年，共计6个数据^[17]，有5个数据没有超出全新世的时代上限，只有一个数据在晚更新世的范围，为距今 39310 ± 2500 年，而最晚的数据可晚至战国秦汉时期。可见这些乌木标本的早晚差距很大，碳十四标本自身看来也是存在问题的。我们现在已很难了解采集时的情况，但是从一般的工作方法上考虑，我们可以相信采样不会与地层有很大的误差，所以在没有更有力的否认这些材料的理由前，应该承认测定的标本和测定的数据，问题是如何看待和解释这些现象。我想，某些学者仅通过一两个测年数据就否定资阳人化石地层，这是不可取的，进而否定资阳人化石的性质，则更是不合适的，因为这有违考古学的基本原则。

成都地院的学者强调了资阳人化石地点的河流阶地性质，这很有参考价值。他们把资阳人化石地层定为资阳一级阶地，认为属于全新世早期，这样也就否定了化石地层属于旧石器时代的可能性。不过，问题并没有妥善解决，反而给考古学界提出了更大的问题，必须更细致审慎地研究四川第四纪地层，认真对待乌木现象，探讨考古文化遗迹与地质地层结合的年代学关系。同样是在资阳一级阶地采集的乌木，也有测定为距今 39310 ± 2500 年的数据；同样是那些动物化石，全部说成是全新世地层的也很难自圆其说。

由于资阳人化石地层和年代的争论，考古工作者在这个地区进行了不懈的考察探索，引出了一系列新的考古发现，用事实为资阳人年代问题的解决创造了有利条件^[18]。目前对此比较合

理的解释可以综合为：资阳人化石和动物化石属于河相沉积，有流水搬运的痕迹和冲刷痕迹，并非原生堆积，化石本身的研究对于确定其性质和年代有最重要的作用。一级阶地一般说来属全新统，但也不排除晚更新统地层的可能性，四川盆地含乌木地层分布广泛，时代也同样存在全新统和晚更新统的差别，因此资阳人化石地层并不一定有问题，从地层关系和化石材料看，它甚至还可以同有关旧石器地点相对比，说明仍有参考价值。

资阳人化石本身并不存在问题，在对化石形态的认识上有小的分歧，但对其性质属晚期智人类型的结论已为考古学界和古人类学界公认，成为我国旧石器时代晚期重要的人类化石标本。吴汝康先生的研究，在当时可比较的材料中，认为资阳人化石与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有某些相似性，可能具有一定的关系。资阳人还存在着严重的牙病，上颌可见明显的病理变化。

资阳人地点发掘的一件骨锥是唯一的文化遗物，出土于第三层底部。骨锥呈三棱长条形，长10.82厘米，深褐色，与化石颜色相近。骨锥的一端经刮削成短尖，且较钝，因使用而变得比较光滑。

2. 富林文化

1960年雅安地区工业局地质队在汉源县进行矿产地质调查时，发现了县城富林镇旁的旧石器遗存，次年就发表了报告^[19]。该地点位于流沙河与大渡河交汇的地方，属于大渡河左岸的二级阶地，在高于河面20~25米的河湖相粉砂层地层中出土了动物化石和石器。1972年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与四川省博物馆对遗址进行了发掘，在约30平方米的范围中，出土了5000多件石制品，以及动物化石、植物遗迹、用火遗迹等，经张森水先生做了深入研究后，1977年发表了研究报告，同时命名为“富林文化”^[20]。

富林镇附近一带为大渡河河谷小盆地。大渡河右岸与富林镇相对一侧也是一片较开阔的小盆地，是大渡河流域山区中的一个很好的适于人类生活的小环境，后来在对面的狮子山也发现了性质相同的旧石器^[21]。这个山间河谷盆地，海拔约790米，地理上属于青藏高原相连的川西高原与川中盆地之间的过渡地带，大渡河水道使之沟通和联系。

富林遗址被认为是一个季节性的石器制造场。文化堆积很薄，而文化遗物却密集丰富，含有大量的碎屑、次品、毛坯、石料、石核和石片，成型石器仅占2.6%，用火证据也只是临时性的篝火遗迹。

一般认为，富林文化旧石器继承了华北旧石器的小石器传统，以小石器、小石核、小石片为特色，还有少量似石叶存在。打片以锤击法为主，也使用砸击法。石器原料主要是板状燧石结核，仅有极少量的其它石料。石核以单台面为主，次为双台面和多台面，具有修理台面的技术。石片极多，绝大多数是锤击石片，极少砸击石片，还见到部分有使用痕迹的石片，这种使用石片似可以作为工具中的一个类型。工具类型可分为刮削器、尖状器、端刮器、雕刻器、砍砸器等，总数仅百余件，而且主要还都是刮削器，其余均较少。残次品约占全部石制品的半数以上。石器的修理加工也主要使用锤击法，单面反向加工为主，既有石片石器，也有石核石器，石器长度一般在30毫米以下。

要特别提及的是，富林文化的砸击石片尽管少，但是颇为典型，特征鲜明，和北京猿人的砸击石片很相似，这是在南方地区的首次发现，这种特征在华北也一直延续到旧石器时代晚期。锤击石片在富林文化中占绝对优势，特征是小、短、宽、薄，平均长度不及1.5厘米，形状可分为梯形、三角形、不规则形等几类，也见个别长石片，研究者认为这还不能归于长石片传统，不过，富林文化中存在过（尽管极为次要）较大的石片和长石片，却是不可回避的事实。似石叶被证明是锤击法、少量是砸击法直接打击的制品，与间接方法打制的石叶不同。在富林文化石器中，还发现一件小三棱尖状器，形态同丁村的大三棱尖状器极像，制作精致，或许是这种石器延续到旧石器晚期的表现。上述这些情况表明，富林文化与华北旧石器文化有着最密切的关系，虽然它地处南方的长江流域，然而其渊源目前看来应来自北方，或许可以认为是华北旧石器文化的以小石器为主要传统的类型向西南发展的结果，而不大可能是西南旧石器文化接受华北旧石器文化影响的结果。据研究，富林文化与大沟湾文化、小南海文化较为接近，可对比的因素很多，其文化性质和年代也相当，但如果考虑到地域间的发展过程，那么富林文化相对而言应该略晚。

富林遗址出土的动物化石比较简单，没有特别典型具有时代意义的种属发现，只有小熊、柯氏熊、野猪、鹿、麂等几种哺乳类化石和三种斧足类化石。出土植物标本有板栗和香叶树。这些对于确定遗址时代意义不大，但可以参考。富林遗址也未做年代测定，从地层地貌和文化面貌上考察，再辅以古生物化石，研究者确认应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其地层属于晚更新世晚一阶段，这个结论没有受到疑议，已为学术界所接受。但是，从考古年代学上，还是需要有更进一步的比较确定的年代依据，有待今后提供测年数据为好。

富林文化的提出，为南方旧石器文化研究，尤其是华北与西南旧石器文化的关系，特别是认识四川旧石器晚期文化及其类型的研究，都有很重要的积极意义，由于富林文化研究较为细致深入，从而提供了一个很有用的标型和范例，在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上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同时也要看到，富林文化中的成型材料还毕竟有限，特别是石器类型并不全面，并不充足，难免有缺失或以偏概全的可能存在，这需要注意并力求寻找机会弥补才是。

3. 成都羊子山打制石器

1956年四川省文管会对成都市北郊外的羊子山西周土台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是一项很重要的考古工作，不仅对巴蜀文化考古提供了一批有价值的资料，而且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在土台基址以下黄土中出土了5件打制石器。这几件打制石器受到了发掘者的重视，并在报告中给予了应有的分析介绍，但是作者对它的认识虽倾向于认为是旧石器，然而解释上又比较含糊，同时还存在矛盾，比如认为这个次生黄土层不能早于全新世，这便又似在否认它的旧石器年代^[22]。由于这个原因，羊子山的打制石器一直没能受到学术界重视，从事旧石器时代考古的专家们几乎对它一无所知，只有不多的几位四川学者在论述中简单地提到过羊子山打制石器的地位^[23]。笔者也曾在1988年专文论证过羊子山打制石器，认为它们属于成都平原的旧石器遗存，年代估计要晚于成都粘土的形成年代，但应早于全新世^[24]。至今笔者也还没能见到这几件